

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

陈书录^{*}

〔摘要〕 明清是地域商贾相对活跃的时期,有所谓的“十大商帮”或“九大商帮”。系统梳理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互动的传统,应该贴近历史真实,更新研究方法,着力发掘明清时期文学与地域商贾及地域文化等三者之间交叉互动中的历史价值、经济价值与美学价值。明清时期文士与商人的交往方式往往有常态性、特殊性两大类,其中常态性的有士而为商,商而为士;文士为商贾撰写墓碑和传记;商贾拜师学诗文;养士资助,诗酒相会等。考察明清时期文士与商人的交往方式还有某些特殊形态的,这主要一是交流中心的聚集与扩散;二是相似地域流派的接应与流变;三是相异地域商贾与文学的比较;四是地域的本土特色与流动视野。

〔关键词〕 地域商贾;文学;互动

“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①

明清时期,涌现着一股商贾与文学互动的思潮。我们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名之曰“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地域文化有两个维度:空间上的地理疆域,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从时间上来说,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明清时期;从空间上来看,包括明清两朝所属的大部分地区。研究的对象是明清时期的文学、商品经济和地域文化,是立足于文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侧重于三者的交叉与互动及其比较,旨在发掘明清时期文学与地域商贾及地域文化等三者之间交叉互动中的历史价值、经济价值与美学价值,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明清文人视野中地域商贾的兴盛之风

明清时代是地域商贾相对活跃的时期。关于明代地域商贾,先看京师:

京师负重山,面平陆,地饶黍谷、驴马、果蓏之利,然而四方财货骈集于五都之市。彼其车载肩负,列肆贸易者,匪仅田亩之获、布帛之需,其器具充栋与珍玩盈箱,贵极昆玉、琼珠、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的互动及比较研究”(10BZW068)成果之一。

^①林苏门:《续维扬竹枝词》,《扬州文库》第二辑,扬州:广陵书社,2015年,第174页。

滇金、越翠。凡山海宝藏，非中国所有，而远方异域之人，不避间关险阻，而鳞次辐辏，以故蓄聚天下饶。^①

明代是南北两京制，再看南京：

沿大江而下，为金陵，乃圣祖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②

金陵（南京）这种“五方辐辏”、“商贾争赴”的盛况，还可以诗与史互证，或曰诗歌与散文互相映衬，明代曾为内阁大学士的李东阳有一首七言古诗《马船行》：

南京马船大如屋，一舸能容三百斛。高帆得势疾若风，咫尺波涛万牛足。官家货少私货多，南来载谷北载鲑。凭官附势如火热，遇人津吏不敢诘。争犖斗捷转防欺，倏去忽来谁复知。乘时射利习成俗，背面却笑他人痴。他人虽痴病亦乐，明朝犯令尔辈缚。官家号令时复传，津吏如今更索钱。^③

诗作虽然旨在揭露明代中期官倒走私粮和盐的严重情况，但也可见南京马船（江淮间行走的快船）往来、商业兴盛的一面，以诗写史，些许欣慰中多有忧愤。

南北京之外，再看“九边”。所谓“九边”，指明代为了防备北虏入侵，相继设立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边镇。在这特定的环境里，成为商贾活跃的边塞。“夫九边互市之初，始以纁币，今以金帛，而虏酋之交易惟马”^④。例如“九边”之一辽东镇，庞尚鹏在《清理辽东屯田疏》中指出：“窃惟辽东京师左臂也。一面濒海，三面与虏邻，惟山海关通一线之路，与内地相接，舟车商贾之利，岁不能十一焉。……一革关税，以资农末。窃惟山海关控扼胡虏，钳制逋逃，凡有附带违禁货物者悉捕治之，此关法也。各省商人往来于此，百货兼备，而农具亦于是取给焉。”^⑤这是说辽东边商活跃的先决条件之一是革关税，而宁夏镇边商活跃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筑边墙：“宁夏地方大小盐池，岁课常患不充，缘守臣以敌寇不时侵軼，捞取则恐惹事而有咎，招商又多畏惮而不来，墙成则得以时捞取，商贾流通，盐课充羨，军用益饶。”^⑥又如固原镇边商流通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增筑屯堡：“臣见固原人烟萧条，城市湫隘，于是增筑城郭，又以小盐池盐立为定价，卖之固原，不匝月商旅日集，官征其直，岁可得银四五万两。”^⑦“九边”商贾流通，既使“军用益饶”，也使边民安居乐业：“九边之外以生齿则日繁，以修守则日固，以兵马则日练，以刍饷则日积，以田野则日辟，以商贾则日通，穷边僻堡阨危残喘之民始知有生生之乐。”^⑧而且，边商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吃苦耐劳：“勤瘁治生，冒寒暑，往来塞外。”^⑨

“九边”之储多依赖两淮、两浙商人：“国家经费莫大于边储，两淮煮海为盐，岁课甲天下，九边之供亿实赖之。”^⑩明代两淮盐法副使袁世振在谈到朝廷为“九边”推行减税宽商的政策后说：“两淮商人皆肩摩毂击，争相输纳。两淮如此景象，开辟以来所未有也。”^⑪王朝用在《应诏陈言疏》中也指出：“天下之财赋尽出于东南，而盐利尤为裕民之厚资。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粮刍尤为备边之急务，故以盐粮召商报中谓飞粮挽刍，诚为筹边至计。但引额原有定数，而先后因革不同。……两浙行盐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隶五府一州与江西广信一府。”^⑫当然，明代“九边”所依赖的不仅是两淮、两浙

①②④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1页、第83页、第86页。

③李东阳：《南行稿》，《李东阳集》第三册“杂记”，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346页。

⑤庞尚鹏：《清理辽东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五八，《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999年。

⑥陆粲：《处置边防疏》，《陆子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⑦秦紘：《论固原边事疏（增筑屯堡）》，《明经世文编》卷六八。

⑧方逢时：《为陈边务申虏情以定国是以永大计事（贡市善后）》，《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一。

⑨徐继畲：《诰封武翼都尉周公朴斋八十寿序》，《松龛先生诗文集》文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⑩庞尚鹏：《清理盐法疏》，《百可亭摘稿》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4—1997年。

⑪袁世振：《与商等轩（盐法）》，《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

⑫王朝用：《应诏陈言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三五。

商人,还有全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如“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①。以上说的辽阳、蓟北(州),均属于“九边”。清朝幅员广阔,其边塞有新的内涵,比如新疆等,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陕甘总督文绶在上疏中指出:“乌鲁木齐,内倚天山,外抚远人,延袤广阔,营制星罗,洵诸路之中权,实重门之保障。其所属吉木萨、特纳格尔、昌吉、玛纳斯等处,屯田甚多,商民臻集。……新疆各处仰蒙圣泽涵濡,天和地润,物产丰美,已成乐土。惟每当丰收之岁,未免有谷贱伤农之虑。今各该处商贾云集,轮蹄络绎,若准令各省商贾士民报捐盐粮,洵足以实边屯而足兵食,裕商贾而济农民。……如此则自肃州以至昌吉,沿边万有馀里,重兵驻扎之区,仓储处处充盈,远近皆为有备,不特支食有资,兼得转输便易,且商贾人等争相购籴,农民咸知粟贵,益皆尽力耕耘。诚如上谕,新疆屯政日丰,既可以实边储,而贫民亦得生养繁息。”^②当时新疆有商贾云集的盛况,呈现出“足兵食裕商贾”、边民生养繁息的兴旺。

说到清代商贾,有所谓的“四大聚”:“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③除“四大聚”之外,还有“天下商贾聚”的广州、杭州、扬州、天津等城市,其中广州“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④其实,早在明初孙蕡的《广州歌》就以饱满的热情描写广州的繁华,洋溢着商业都市的勃勃生气:

岭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朱楼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
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岢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
闻管弦。^⑤

真不愧为“天下商贾聚”的都市!不仅四季如春,风月无边,而且商贾荟集,民物殷富,将渗透着商品意识又富有风情之美的画面生动地展示在人们眼前。

明清两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阶段,也是地域商贾活跃期,有所谓的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也有所谓的“九大商帮”说:“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有京帮、津帮、陕帮、山东帮、山西帮、宁帮、绍帮、广帮、川帮等称。”^⑥在此,我们根据明清商贾活动的具体情况,与“十大商帮”或“九大商帮”的说法略有不同,从不同地域的视角看明清商贾。

一是看徽商。“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⑦。正因徽商有如此的适应性和扩张性,所以当时谚曰“无徽不成镇”^⑧,说的是徽商几遍全国。以往人们称徽商为“新安商人”,明代归有光说:“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故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倚顿之盐,乌保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縠,拥赵女,鸣琴跼屣,多新安之人也。”^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徽州歙县人程浩有一首《漕运》诗:

漕运东南岁万艘,涉江逾济不曾休。

尽知奔走供臣职,敢谓疮痍切主忧。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序,《天工开物》卷首,南京:凤凰出版社,1992年。

②文绶:《请实边屯疏》,《清经世文编》卷七二,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

③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93页。

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75页。

⑤孙蕡:《广州歌》,《西庵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⑥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农商类》,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86页。

⑦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第83页。

⑧民国《歙县志》卷一《风土》,《中国地方志集成》之《安徽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⑨归有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9页。

近报田租增户额,遥闻河决断淮流。(壬子秋河决,邳、徐之间水遂散漫,淮涸而浅,由是漕运艰阻)

挽输北上三千里,借问何时达帝州。^①

从诗中的“挽输北上三千里”,联系到曾在嘉靖时总督宣府、大同等军务的杨博所说的“国初盐法谓之飞挽,商人射利以输边,边人得米以糊口,良法美意无以过之,但官司畏避嫌疑,多派斗头,以致商人不愿上纳,勘合徒存,置之无用,仓庾尽虚,取之不给,失策甚矣”^②,可知此诗是写“飞挽”输送盐、粮以支边,也可知徽商在“淮涸而浅”的情况下“挽输北上”的艰辛,诗的险境中有忧愁,也可见商人迎难而上的勇气。

二看晋商(山西商)。“河以北为山西……自昔饶林竹笋旆玉石,今有鱼盐枣柿之利。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倚边寒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③晋商一方面崇尚勤俭,一方面好事商贾(末,即商也),因而出现了富甲天下的晋商。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④谢肇淛将徽商与山右(山西)商视为当时商贾中“称雄者”,并将二者进行比较:“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⑤从地域商贾到地域民风民俗进行比较,从中可见徽商、晋商的地域特色。当然,徽商、晋商等也有其相同之处,近代洋务派代表薛福成指出:“中国地博物阜,迥异诸国,前此善通有无者,有徽商,有晋商,有秦商,皆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亦颇能创树规模,相嬗不变者数世。”^⑥徽商、晋商等的相同点是“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自创规模,数代相继。

三看江右(西)商。“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汉,实为吴、楚、闽、越之交,古南昌为都会。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故其人内啬而外侈。”^⑦江右地区的民风商风是“质俭勤苦”、“多设智巧”,因而明初江西峡江人练子宁希望得廉介端慎之士治理关税:“(江西)临江当东南水陆之冲,而淦又居上游,凡闽广之货登于舟车者必道是,乃得他适,故关市之税常重他县。苟司税者不得其人,则商贾之经邑者指日牵引潜伏远去,期不鬻于是而后止,则用之入千上者,未见其赢。而民之役于是者,已告病于下矣。故必得廉介端慎之士、疏通练达之材,权其轻重,制其盈缩,然后商贾之货溢于市廛,而民之役于是者可计日而待更焉。然则征榷之职虽卑,而非得其人不可也。洪武十年,平阳白氏初来莅是职于淦,敏而廉,介而通,商贾之出于是者,皆颂其贤,而缗钱之入,民无通病者焉。于戏!其余所谓得其人者矣!”^⑧显然“敏而廉,介而通”的官场之风与“质俭勤苦”、“多设智巧”的江右民风商风是相融通的,而江右商的“多设智巧”则有别于徽商、晋商的“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之风。

四看陕甘商。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指出:“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若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凉、庆、甘、宁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商之利途,今称边戍之绝塞矣。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閭阎贫窳,甚于他省,而生理殷繁,则贾人所聚

①程诰:《漕运》,《霞城集》卷十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②杨博:《复大学士高拱等建议责成宣大等七镇边臣及时整饬边备疏》,《杨襄毅公本兵输议》卷二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③⑦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第82页、第84页。

④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1页。

⑤谢肇淛:《五杂俎》卷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⑥薛福成:《论公司不举之病》,《庸庵海外文编》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本。

⑧练子宁:《送白税入京序》,《明经世文编》卷十。

也。”^①时至明代，穷则思变，经商谋利。陕西延绥等镇是边塞，边区应推行特殊的政策，进一步疏通盐法。明代梁材在论述其边储时指出：“往岁收成颇好，粮草易集，商人得利；迩来灾伤踵至，本色价高，加以私贩盛行，斗头未减，科罚劝借，秤掣迟留，以此商人不乐开中，故济边虽资于盐，而禁私贩，减斗头，戒科罚，勤秤掣为便。夫私贩不禁，则官盐愈滞；斗头不减，则价色益高；科罚不戒，秤掣不勤，则商人赔费，而坐守益困。”^②说明商人得利，盐法疏通，边储充实；否则商人失利，坐守益困，边储匮乏。对于甘肃、宁夏一带，也应以特殊的政策使边境民富商裕，清代金镇在《盐法考》中指出：“（明朝）永乐中，令商于各边纳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准盐一引，于是富高大贾自出财力招游民垦田，田日就熟而年谷屡丰。甘肃、宁夏粟石直银二钱，边以大裕。”^③

五看荆楚商。与“苏常熟，天下足”^④谚语相匹配的是“湖广熟，天下足”^⑤谚语。明朝的湖广行省主要包括湖北、湖南。先说湖广的鄖阳：“自鄖阳一抵西安，一抵汉中，一抵南阳，增置铺舍，疏凿险阻。今商旅络绎不绝，公文四达无留，居民乐业，政令流通。”^⑥再从鄖阳这一点到面——荆楚：“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鱼粟之利，遍于天下，而谷土泥途，甚于《禹贡》。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鄖、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⑦由此可见，荆楚地域之风是寡于本地的“鱼粟之利”，多求于外出经商之利。

六看闽粤商。与荆楚寡于本地的“鱼粟之利”不同，“山川秀美，土沃人稠”的闽地善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以江、浙为藩篱，东南抱海，西北联山，山川秀美，土沃人稠。地饶荔枝橘柚，海物惟错。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官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蓄而贵侈。……粤之东西，在岭海间，古称百粤。粤以东，广州一都会也。北负雄、韶，兵饷传邮，仰其榷利。东肩潮、惠，内寇外夷，为患孔棘。高、廉、雷、琼，滨海诸夷，往来其间，志在贸易，非盗边也。顾奸人逐番舶之利，不务本业，成肆行剽掠耳。”^⑧一方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民多仰机利而食”；另一方面“多贾治生”，“志在贸易”。与徽商、晋商“勤俭为用”不同，闽商“贱蓄而贵侈”。广东商亦称粤商，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说到“粤西商况”：“粤西土产，以药料为大宗。潯桂田三七，其最著也，余如桂枝、桑寄生之类。大舟捆载，有同柴薪，分向广东、湖南两路而去。外则米粮接济广东，每年出境，约值银二百万两，地方生计，赖以转输。凡日用所需之斤盐尺布，皆由湖南、广东二省贩运。梧州一关，扼左、右江之冲，百货往来，征榷极重。其市廛繁盛，帆樯林立，几与湘潭、汉口相埒焉。”^⑨闽广沿海，多有海运之便，清代福建漳浦人蓝鼎元在《漕粮兼资海运疏》倡导疏通海禁：“欲求节劳省费之策，以为国家宏远之图，莫如兼资海运。……今之海道已为坦途，闽广商民皆知之。臣生长海滨，习见海船之便利，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⑩至于闽地的建宁，也是南北商贾“无不辐辏”之地：“建宁居七闽之上游，襟山环水，东邻括苍，北距上饶，而西南之间遥控交、广。凡福、兴、泉、漳诸郡，品物之贡输，三吴两浙商贾之来往，罔不辐辏于斯。”^⑪显然，充分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兼资海运”，海外贸易，是明清闽粤商贾的主要特点之一。

①⑦⑧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第82页、第83页、第84页。

②梁材：《议处陕西四镇边储疏》，《明经世文编》卷一〇四。

③金镇：《盐法考》，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卷五十，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

④陆游：《常州奔牛闸记》，《渭南文集校注》卷二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8页。

⑤朱伦瀚：《截留漕粮以充积贮劄子》，《清经世文编》卷三九。

⑥余子俊：《地方事（鄖阳）》，《明经世文编》卷六一。

⑦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农商类》，第2333—2334页。

⑧蓝鼎元：《漕粮兼资海运疏》，《清经世文编》卷四八。

⑨杨荣：《送徐都指挥还建宁序（都闽还闽）》，《明经世文编》卷十七。

七看两浙商。两浙,是指浙东、浙西。“浙江右联圻辅,左邻江右,南入闽关,遂达瓯越。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山川秀丽,人慧俗奢,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膏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苧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缁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宁、绍、温、台并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来,人获其利。严、衢、金华郭郭徽、饶,生理亦繁。而竹木漆柏之饶,则萃于浙之西矣。”^①浙江还有明清十大商帮中的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广志绎》中说:宁波等地“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②。两浙“山川秀丽,人慧俗奢”,“俗奢”的一面似闽粤,但浙商秀慧的一面不仅能立足本地,地尽其利,而且能借力发展,“估客往来,人获其利”。这引起了两浙人的自信自豪:如清代光绪年间宁波人王荣商在《与端午桥制军》中指出:“如此则船商运货而入,贩米而归,百物流通,农商交利,贫民皆可自食其力,而厘金收数较增于军饷,亦不无小补。此(王)荣商所谓乡里之私,实则蒙泽者不独宁波商民。”^③龙游商贾与宁波商贾一样,也是“百物流通”的生力军:“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故俗有‘遍地龙游’之语。”^④

八看扬州、苏州商贾。隋唐时,扬州是富甲天下的商业大城市,那里中外“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成都)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⑤。当时的苏州商贾云集,市场繁荣。《吴郡志》中说:“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苏,杭为会府,谚犹先苏后杭。”^⑥到了明清时代,扬州、苏州的商贾依然以“繁雄”著称于世。明代王璘描写扬州商贾的《商贾行》云:

扬州桥南有贾客,船中居处无家宅。生涯常在风波间,名姓不登乡吏籍。前年射利向蛮方,往来行贩越海洋。归来载货不知数,黄金绕身帛满箱。小妇长干市中女,能舞《柘枝》歌

《白苎》。生男学语未成音,已教数钱还弄楮。陌头车轮声格格,耕夫卖牛买商舶。^⑦

这首歌行写明初从事海外贩运的扬州商人豪华阔绰的生活,由此影响到农民弃农经商。前十二句写海运富商,后二句写农民反应,一与多对比,颇有震撼力。明清时期的两淮盐商,大多麇集于扬州等地。明清盐业生产与销售相当发达,明朝政府从中得到财政收入的一半,而从淮盐中得到的收入最多。清代扬州及淮安等地盐业,至乾隆时达到高峰,四方盐商云集扬州,城中商民杂处,一度多达数十万家。扬州盐商以徽商最早最盛:“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有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⑧扬州等地盐商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为“亦儒亦商”。如马曰琯、江春等盐商,大多“商而兼士”,并著有诗文集。他们附庸风雅,与文人交相唱和,所谓“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林苏门《续维扬竹枝词》)。对于高雅艺术如昆曲等的发展,扬州等地的盐商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扬州画舫录》卷五中说:“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⑨随后各盐商竞相效仿,“大洪班”、“德音班”、“春台班”等相继登台亮相,使扬州成为昆曲的第二故乡。后“四大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曾经分析正德(1506—1521)前后的情况:“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

①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第83—84页。

②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7页。

③王荣商:《与端午桥制军》,《容膝轩文集》卷八,《清代诗文集汇编》本。

④民国《龙游县志》卷二《风俗》,《中国地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

⑤汪珂玉:《古今藻略》卷九,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⑥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⑦王璘:《青城山人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⑧陈去病:《五石脂》,《遗闻杂录集》,《陈去病全集》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98页。

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07页。

前矣。”^①这种弃农经商、活跃商品经济的势头,在当时的苏州境内发展较快。如苏州府的吴县人,“人生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②。在这种环境中,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吴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③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势必促成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货殖为急”^④,打破了“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涌现出一批亦儒亦商的人物,如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中写的苏州昆山方麟,便是吴地亦儒亦商的一个较早的典型。他借助于这个典型人物,对士、农、工、商的价值作了新的评论:

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⑤

对于这种士农工商同道、义利相互兼顾的观念,吴地文士也同声相应。早在弘治、嘉靖年间,“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唐寅以商人子弟的身份,在《阊门即事》诗中描写了苏州商业中心阊门一带的繁荣景象:“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⑥由此可见,重商通商观念已深入到苏州人的文化心态之中,成为苏州地域文化的又一重要特色。

明清苏州府中还有号称“十大商帮”之一的洞庭商帮。洞庭商帮是形成于太湖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苏州市西南)的商人集团。明代归有光说洞庭人“好为贾,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⑦。明末冯梦龙编撰的《醒世恒言》中写道: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却做‘钻天洞庭’。”^⑧

二、探究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互动的轨迹

在明清文学的研究中,反映历史真实与更新研究视角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努力寻找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发展的历史真实的契合点,在这个“契合点”上探究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交叉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考察明清时期文士与商人的交往方式往往有常态性、特殊性两大类,其中常态性的轨迹,大概有如下四种。

其一是士而为商,商而为士。明清时期产生了有别于以往“贵士贱商”的观念,如“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⑨徽州歙县人汪景晃“年二十二,弃儒术,操百缗以往贾于浙江之兰溪”,成为一名弃儒经商者。后来经商致富,晚年荣归故里,“力不能亲师,建馆舍,延儒生,以诱其来学”,“年已九十有四,犹顾其子姓幼稚者,与倍讽所读书,曰‘人心不可无所事,无事则心放;吾数十年来,独坐则暗诵前载而已’”^⑩。显然,他又是一名贾而好儒者。山西人王现“弃士而就商,商四十余年,百货心历,足迹且半天下,然卒老于盐场。……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

①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1—112页。

②(崇祯)《吴县志》卷十,《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

③《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引曹时聘语,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④黄省曾:《吴风录》,续修四库全书本。

⑤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王阳明全集》卷三三《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41页。

⑥唐寅:《阊门即事》,《唐寅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8页。

⑦归有光:《叶母墓志铭》,《震川先生集》卷二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22页。

⑧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

⑨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658页。

⑩刘大櫟:《汪府君墓志铭》,《刘大櫟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9—250页。

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①。又如苏州商人方麟弃举子业而随其妻家经商，后又“以士业授二子鹏、凤，皆举进士”^②。应该说，士而为商，商而为士是明清时期商贾与文士互动的常态性的途径之一，也是促进明清文学兴盛的一个动因。

其二是文士为商贾撰写墓志碑铭和传记 明中叶以后，商人在墓志铭和传记中出现逐渐增多，李梦阳、康海、归有光、李开先、李攀龙、王世贞、汪道昆、李维桢、蒋士铨、魏禧、袁枚、赵翼、厉鹗、杭世骏等一大批文士都为商贾撰写墓志铭和传记。明代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中有墓志铭（包括墓表、神道碑、墓志铭、墓碑、行状）、传记等近六十多篇，考察他为商贾撰写传记和墓志铭等的原因，或是受墓（传）主的子孙及好友的请托，或是因为墓主的子孙入仕而墓（传）主被赐封官爵，或是接受润笔费，或是出于褒扬商贾及其才德。尤其到明中后期，墓志铭写作成风，虽“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③。明清出现了大量的商贾传记，包括墓志铭、神道碑、墓碑、墓表、行状等，虽然其中不乏应酬之作，缺乏一定的真实性和文学性，乃至也有“谀墓”，但这是明清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明清时期士商互动的一个突出的方面。

其三是拜师学诗文 明清士商互动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不少商人向文坛泰斗拜师学诗，如王寅曾学诗于李梦阳，据钱谦益《列朝诗集》中说：“寅字仲房，歙县人，父贾淮北，生仲房于淮，小字淮孺。少年倜傥自负，具文武才，以高才为诸生祭酒，辄弃去不顾。北走大梁，问诗于李献吉，不遇。”^④徽商郑作，在钱谦益眼里已是一位有所成就的诗人，为其所写的小传中指出：郑作“为诗敏捷，一挥数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门下，论诗较射，过从无虚日”^⑤。徽商程诰“字自邑，歙县人。居于汴溪，自号汴溪山人。杖策游华山，从李献吉游，酬和于繁吹两台之间。黄勉之诸人北学于空同者，皆以自邑为介，然其诗殊有风调”^⑥。另一位商贾诗人余育也与李梦阳有文学交往，李梦阳为其所作的《潜虬山人记》中详细地记载着徽州商人余育向李梦阳学诗的情况。王世贞也是商人们向慕求教的对象，如新安商人程嘉燧之父对王世贞的向慕之情：“余友嘉定唐子时升，工古文辞，不妄许可，顾独与书生新安程嘉燧善，因而知其父布衣君。布衣君贾于嘉定，垂三十年，日闭户读书，未尝饰冠剑、奉筐筥以游大人而成其名，顾独嗜余（王世贞）文章，时时语唐子：身居约，安得一日从弇州先生游，即死不恨，然未几死矣。”^⑦在清代扬州盐商中出现“商翁大半学诗翁”的盛况。马曰琯有《沙河逸老集》10卷和《嶠谷词》1卷；马曰璐著有文集6卷、词1卷，合为《南斋集》。徽商中的郑作有《方山子集》，余存修有诗集《缶音》，胡镇有《梦草堂集》，浙江商人童佩有《童子鸣集》。王世贞曾为徽商程汝义诗集作序，胡应麟曾为徽商吴德符诗集作序。

其四是养士资助，诗酒相会 早在明代中期，徽商余育“于山间构潜虬书院，以馆四方交游暨来学者，而收训其族子弟”^⑧。清代中期的袁枚在《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中称赞马曰琯云：“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⑨扬州的徽商马曰琯、马曰璐、江春等供养或与之唱和的有厉鹗、全祖望、袁枚、赵翼、蒋士铨、杭世骏等著名文人，还有盐商支持的书院（如马曰琯出资重修梅花书院）培养了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和汪中、洪亮吉、孙星衍等大批知名学者，所谓“梅花安定广陵（指扬州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广陵书院）兼，膏火（点灯的油，借指求学的费用）来源总是盐。”^⑩

①李梦阳：《明故王文显墓志铭》，《空同集》卷四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②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王阳明全集》卷二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41页。

③唐顺之：《答王遵岩》，《唐荆川先生文集》卷六，《唐顺之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76页。

④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十“十岳山人王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964页。

⑤⑥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卷十一，第3542页、第3536页。

⑦王世贞：《新安程君墓志铭》，《弇州续稿》卷一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⑧李梦阳：《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四八。

⑨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七，《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87页。

⑩倪澄瀛：《再续扬州竹枝词劫馀稿》，《中华竹枝词全编》（江苏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73页。

扬州徽商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那些与其交往的文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需要。明清时期的一些巨商豪贾还凭着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一批文人提供了从事文学创作、文史研讨的良好物质条件和温馨的氛围。最著名的如清代前期“扬州二马”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资财丰厚,筑造“小玲珑山馆”,藏书甚丰,礼遇寒士,厉鹗即为其中一员。据李斗记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①他们举行的文事活动频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如乾隆八年(1743)马氏兄弟和厉鹗等文人在其别业行庵举行聚会,吴中画家叶震还为他们绘制文宴图,厉鹗撰写《九日行庵文宴图记》,从中可见参加文宴诗会的十六人:胡期恒、唐建中、方士庶、闵华、全祖望、张四科、厉鹗、陈章、程梦星、马曰璐、方士庶、汪玉枢、马曰琯、王藻、陆钟辉、洪振珂。其中马曰琯、马曰璐、汪玉枢、洪振珂为盐商,程梦星亦官亦商,方士庶、方士庶、王藻曾经商,厉鹗、全祖望、陈章为寄寓扬州盐商的文士。显然,这是士商的文宴诗会。又如清代乾隆年间扬州巨商江春,以布衣与天子交,也是文人雅集的重要组织者,“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②。他构筑诗文酒会的场所随月读书楼、秋声馆、“深庄”、“江园子”等等,后又重建康山草堂,人称“康山主人”。江春以自己的物质财富,为一批文人提供了文化交流和文学创作的场所和氛围,并组织各种文事活动,诗酒相会,为一时文坛佳话。

三、明清文士与商人交往的特殊形态

考察明清时期文士与商人的交往方式还有某些特殊形态的,主要有以下四类。

一、交流中心的聚集与扩散。一个时期,商贾与文学互动有其中心地区,明清时期是北京、南京(江宁)、扬州、苏州等地。以苏州为例,明清苏州府中有号称“十大商帮”之一的洞庭商帮,当时有“钻天洞庭”之说。正是在这丰厚的经济土壤中,滋养着本土文人如明初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四杰”、明代中前期以祝允明为代表的“吴中派”有关商贾的文学,各以情、理偏胜;明代中后期的王世贞受到商贾“因俗为变,与时消息”^③经商方式的影响,文学思想由格调转向性灵与俚俗;饱受明清换代之际沧桑的吴伟业有关商贾的诗文、戏曲中多有盛衰兴亡之感,既有时代特色,也有地域特色。其实,明清时期苏州本土文人还有王鏊、冯梦龙、顾炎武、钱谦益、彭兆荪、王韬等,均有关于商贾的文学。一个面积不大的苏州府,在明清时期聚集如此之多的文人关注商贾,不愧为商贾与文学互动的中心。聚集于苏州这个中心的,不仅有本土文人,还有如湖广公安的袁宏道、袁中道等客居流寓(包括为官)者。袁宏道在任吴县县令时深受苏州地区商潮影响,思想更为解放:“为吴县日,倡为觞咏,遍排名流,历诋往哲,举当世所奉盘帨而插骚坛者,悉掊而仆之,虽众怒弗忌也。”^④因而,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于苏州吴县结合袁中道(字小修)的诗歌创作成果作《叙小修诗》,大胆树起“独抒性灵”的旗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⑤经过王阳明的“心学”到李贽的“童心说”,又经过吴国伦、王世贞等由格调向性灵的转变到徐渭、汤显祖的“至情论”,袁宏道、袁中道等人终于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将晚明文学解放思想推向高潮。苏州中心既有聚集,也有扩散,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后来寓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的袁枚,与洞庭商人有直接的接触。乾隆四十四年(1779),袁枚曾游吴县洞庭山,与洞庭商人蔡璘之子相见。后又为蔡璘作传,即《吴县文学蔡君勉旃传》,其中有云:“君姓蔡,名璘,字勉旃,以太学生居洞庭山东蔡里。生而醇粹,通识懿文。游楚贸迁,以其赢奉

①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八,第180页。

②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二,第274页。

③王世贞:《程处士惟清墓志铭》,《弇州续稿》卷一二二。

④孙锡蕃:《袁宏道传》,《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二,第1663页。

⑤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页。

高堂，恤孤稚。”^①在包括苏州在内的商贾影响下，加之其他多种因素，袁枚成为清代中期性灵派的主将。他又招收弟子，如从《随园诗话》中可考的有金陵何士颙、昭文（今江苏常熟）孙原湘等二十余人，又有女弟子如苏州的席佩兰、金逸、严蕊珠以及杭州的孙云凤、孙云鹤，武进（今江苏常州）的钱澹青等五十人左右，将性灵文学思潮扩散到多个地域。至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其追随者有“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琅琊四十子”，“自嘉靖末，迄今八十余年，七子之风声，浸淫海内”^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运用几乎原始的传播手段，竟然扩散如此之广，令人惊奇！

二、相似地域流派的接力与流变。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互动中的某种思潮，有时以“接力”的方式发展与演变。比如明清时期的性灵文学思潮，经历明代湖广兴国地域的吴国伦等传递给湖广公安地域的“三袁”，再传给湖广竟陵地域的钟、谭，又隔代传递，传给清代中期江浙地区的袁枚、赵翼等，如此相互传承，接力推进，由发轫、高潮到复兴，其动因之一是湖广、江浙及徽州地区商潮的影响。这种地域商潮对于各个地域的作家或文学流派的影响，有本地域的，也有外地域的（如徽商），还有多地域商潮交叉的；既有多个地域的相似性，也有不同地域的差异性，丰富多彩而又指向一致，以蕴含着包括商贾在内的市民思潮所推进的文学性灵思潮冲击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复古思潮或考据之学，具有文学解放思想的意义。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阳湖派被一些人视为桐城派的分支，是两个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其接力与演变颇有典型意义。姚鼐等桐城派的“义理、文章、考据”的文学主张与徽商有关。义理属于儒家伦理、道德、性气、政治范畴的内容，与徽商“尤爱朱子《纲目》之书”^③即程朱理学密切相关，也与桐城派作家视野中的贾名儒行、仁心爱人、诚信处世、孝悌睦姻、朴茂诚慤、廉介守节等的徽商精神密切相关。

阳湖文派与桐城文派之间有“接力”，也有变异，比如对待骈文与散文，桐城派是骈文对立论者，而阳湖派往往主张骈散合一，如桐城派中姚鼐《古文辞类纂》中选入的辞赋数量很少，而阳湖派中张惠言《七十家赋钞》选录屈原《离骚》至庾信辞赋等骈体范文774篇。张惠言的骚体赋如《游黄山赋》《寒蝉赋》《秋霖赋》等用辞讲究，色彩斑斓；其散文往往笔力纵恣，于雅润中见气势，缜密而又不乏典丽。这固然与吴地“缘情而绮靡”^④的地域文学传统有关，也与包括商贾在内的吴地风俗有关：“徽人善为生，多能货殖致素封，其家子弟皆习纤啬，鲜能读书亲师友。而吴中之俗侈靡，士习于儇薄，多以虚声相炫耀。”^⑤桐城派、阳湖派文学主张与文学创作的异同，可以从中找到一种原因——地域商贾之风的异同。从这一个角度看桐城派和阳湖派，或许是一个贴近历史而又比较新颖的视角。

三、相异地域商贾与文学的比较。这种比较有其特殊性，如论述山西地域商风民俗时有四组反比：一是将晋商与吴越商贾作反比，如康熙皇帝曾说“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⑥，突出了晋商之“多俭”；二是将晋商与徽商作反比，如谢肇淛《五杂俎》中说“新安奢而山右俭也”^⑦，突出了晋商之“俭”与徽商之“奢”；三是将“晋风多俭”与闽商“贱啬而贵侈”进行反比；四是将徽商与吴地商贾作反比，吴地文人王世贞评说徽商勤奋而纤俭：“新安僻居山溪中，土地小狭民人众，世不中兵革，故其齿日益繁，地瘠薄不给于耕，故其俗纤俭。”^⑧这与“吴俗靡”^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徽商在与吴地商贾的反比中为“纤啬（俭）”，而与晋商的反比中则为“奢

①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四，《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69页。

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陆征士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99页。

③刘大櫆：《吴萼千墓志铭》，《海峰文集》卷七，清刻本。

④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撰，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1页。

⑤戴名世：《邵生家传》，《戴名世集》卷七，第204页。

⑥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十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⑦谢肇淛：《五杂俎》卷四，第74页。

⑧王世贞：《赠程君五十叙》，《弇州四部稿》卷六一。

⑨王世贞：《赵室袁孺人墓志铭》，《弇州续稿》卷一一六。

靡”，评价截然相反。显然，在以上四组反比中充分显出晋商之“多俭”，有反反得正、相反相成的效果。

苏州、徽州虽然同属江南，但两个地域的商贾之风迥异。这以明代中后期王世贞的视野为例。在王世贞的视野中苏州商贾的特色，一是既以“钻天”术经商致富，又讳富藏富。王世贞曾多次出游洞庭东、西山，其《处士春山翁君暨配吴姥合葬墓志铭》《蔡孝廉林泉墓志铭》等，记载他与洞庭商人翁参、蔡伯玉和其父蔡翁的交往，从而领略了“钻天洞庭”的风貌。二是纵情享受，畅舒心志。王世贞曾为吴地商人张冲作传，其中有云：“君读书猎大较，不好为章句，弃之。北走燕，遯其游闲公子日驰章台傍，揆瑟，揄袂，跼蹐，陆博，从耳目，畅心志，衡施舍，盖期年而橐中千金装行尽乃归。”^①三是喜读稗史，趣在俚俗。明代苏州商人时恩之妻“性端静，少通《曲礼》及稗官家言”^②。顾学（号南野）“少负气倜傥，不喜习博士家言，而独手《庄子》一编不置，曰：‘能前得我意者是书耳。’至稗官史家若传《水浒》者以猥褻闻，而翁间喜之曰：‘亦可以快浊世愤也，不犹愈于城旦书乎？’”^③所谓喜好“稗官史家若传《水浒》者以猥褻闻”中的“传《水浒》者以猥褻闻”，很有可能是指《金瓶梅》。而与苏州商贾形成对比的是徽商，在王世贞的视野中徽州商贾的特色，一是不讳商贾，致富有方。王世贞在为徽商许鋈作传中说：“今天下不为贾而贾行者，其人类讳贾，独徽之人不讳贾，以故豪长者多游其间，然其大指以趋射干没技相高。”^④二是攀附显要，官商结合。例如徽商汪振芳科考落第，“以是弃去，挟其赀贾湖海间，纵观名山之胜，入游都下，曰：‘吾观以宫阙陵园为归，以贤士大夫为鹄。’闻驸马都尉京山崔侯好客而文，踏门曰：‘江南布衣汪某请见。’崔侯延之入，与语合，置上坐。已，稍露其诗，侯大叹服。”^⑤三是转修诗书，儒商并行。在王世贞的笔下，徽商往往“不专治生，而间治诗”^⑥；“贾其行，士其谊”^⑦。这大致是从正面说的，再说反面即两地奸商进行对比。清代乾隆时的丰城（今属江西）人徐文弼从地域商贾的角度分析了南北奸商之弊：“夫盐徒贩私，皆奸民与场丁交通，奸民利得贱盐，场丁利其售货。其私贩所至之地，又必有窝家，而乡村小民食私较食官颇贱，故群相争买，而贩私盐者亦因其易售而视为恒业，于是私盐盛行而官盐日壅。然更有大夥盐徒，南方撑驾大船，北地多驴驮负，弓刀炮火，白昼公行，庄村任其经过，捕壮不敢稽拦。其尤可怪者，官商纳课领引到场卖盐者也，如直隶、山东等之商，所认各州县额引在盐场运行，州县例有销引考成，不得不督责民间买食，其如本乡贪图多卖，反暗买私盐而充官盐，以致盐多难销。又藉口民多食私，而令官壅，此北地奸商借官行私之弊也。如江淮、两浙之商，例有管理上场、下河等夥计，其不肖之徒纠合无赖，连樯运载，明插旗号，挟持官引以为影射，江河四通，莫敢伊何。又间有大胆豪商，贿通官长，捆载多觔，公然行掣，径同额盐一体装往地头发卖，或别售他乡以取倍称之息。此南方奸商借引行私之弊也。”^⑧在徐文弼看来，南北方奸商的区别，一是多贿通官长，驾大船运盐，“借引行私”；一是多与场丁交通，以驴驼盐，“借官行私”。而南北奸商共同之处都是败坏盐法，中饱私囊。

四、地域的本土特色与流动视野。一个地域有其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中，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文化，可称之为地域民俗，或地域的本土文化。康熙皇帝曾经将晋商与吴越商人作比较：“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⑨山西素有“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⑩的地域文化特色。明清晋商发扬这种传统，敢走西口，塞外经商谋利；首创票号，全国汇兑。山东

①王世贞：《张隐君小传》，《弇州四部稿》卷八四。

②王世贞：《守愚时君暨配沈孺人合葬志铭》，《弇州续稿》卷一一七。

③王世贞：《处士南野顾翁墓志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二。

④王世贞：《许长公小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二。

⑤⑥王世贞：《汪处士希胤墓志铭》，《弇州续稿》卷一二四。

⑦王世贞：《处士程有功暨配吴孺人合葬志铭》，《弇州续稿》卷一一六。

⑧徐文弼：《缉私盐》，《清经世文编》卷五十。

⑨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十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⑩王士性：《广志绎》卷三，第66页。

地域文化称之为齐鲁文化,也可视为山东本土文化。邹鲁为孔孟之乡,具有深厚的儒学根基。齐地濒临渤海、黄海,有沧海桑田、神奇变幻的地域氛围,“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苏轼也在《登州海市》诗中写道:“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崇尚儒学的鲁文化影响到明清商贾文学,其中多有义利兼顾的儒商;神奇变幻的齐文化影响到明清时期商贾文学,尤其是影响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出现不少狐仙鬼怪变化而成的商贾,给明清山东商贾与文学平添了神奇浪漫的地域特色。有的文人不仅具有地域的本土文化,也有流动视野。例如自称“我今为秦声”^①的李梦阳,在他的诗文中还关注晋商、徽商、荆商等,甚至将视线投向从范蠡所处的春秋末年到明代弘治、正德近二千多年历史上的商贾。又如明代戏曲家兼诗文作家汤显祖,晚清一代名臣徐继畲,清末民初的经商实业家郑观应等睁眼看世界,关注外商和对外贸易,在诗文与戏曲中展现海外经商的新世界,令人大开眼界,大开怀抱。

总之,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明清时代,有其新的特点:新的经济(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新的阶层(包括商贾在内的市民阶层)更为壮大,生活观念更为开放,审美情趣更为多元,文学题材更为包容,其中商贾形象更为活跃,还有抨击奸商恶贾、权贵污吏、税挡阉奸,力倡商屯实边、通商惠商、御虏抗倭、疏通海禁、海外贸易及禁止鸦片等方面的作品。面对这座商贾形象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我们旨在开阔视野,更新视角,探微索隐,取精用宏,系统梳理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互动的传统,发掘其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

(责任编辑:高峰)

Regional Merchants and Literatur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Shu-lu

Abstrac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well known for their regional merchants, who formed ten or nine major distinctive groups characterized by the local cultures of their birth places.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hen regional merchants and the literature in that period systematically, we have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historical facts, update our research methods, and work out the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literature, regional merchants and regional cultur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s and mercha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a general one and a specific one. The former type covers the following phenomena: the intellectuals became merchants or vice versa; the intellectuals wrote biographies for the merchants or composed the text of the inscriptions carved on the tombstones of the deceased merchants; the merchants learned from the intellectuals about how to read and write; and the merchants sponsored the intellectuals to do literary creations. The studies on the specific patterns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formation of a center for merchant-intellectual intera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other areas;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s in the literary ideas and practice between the regional groups which were similar to each other culturally and economically; the comparison of the merchant-intellect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regional groups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culture and econom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ocal culture and the cultures in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 regional merchants; literature; interaction

^①李梦阳:《七夕遇秦子咏赠》,《空同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